

中东变局后北非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

——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分析视角

贺文萍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经济属性、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告诉我们，民主的产生、建设与巩固，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走向衰败的经济和民生、日益分裂的社会、缺乏宽容、尊重和容忍的政治文化，这些都对北非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当下，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利比亚的内乱还未有穷期，突尼斯和埃及的社会政治变革仍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北非国家要走出民主转型困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民主理论 马克思主义 中东变局 北非国家

作者简介 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7）。

在过去的几年里，北非地区发生了很多始料不及和令世人瞩目的变化。2010年底，始自突尼斯的北非政治变革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北非三国的长期威权统治。先是中东变局的诞生地突尼斯，该国执政23年的前总统本·阿里在28天的群众抗议后下台并流亡沙特，接着是执政30年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18天后黯然下台并被囚禁审判。结局最惨的利比亚“沙漠强人”卡扎菲，其长达42年的铁腕统治则是在近7个月的利比亚血腥内战后以他本人的死亡而画上句号。

中东变局初起之时，一些西方舆论认为北非国家的民主进程将由此开启。然而，4年多时间过去了，上述三国中除了突尼斯的转型过程尚属基本顺利和

稳定,^① 其余两国的民主转型则遭遇重大挫折、陷入困境。利比亚迄今仍基本处于各部族武装占山为王、国家机构的建立都没有完成的混乱阶段。埃及在过去几年里则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政局逆转和血雨腥风式的抗议与镇压。穆巴拉克的出狱以及首任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判死刑引起很大的国际争议,一些人认为“埃及革命的惊人倒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阿拉伯之春’革命已经死亡”。^② 那么,为何埃及和利比亚两国的长期威权统治和强人的倒台并未迎来自由和稳定,反而陷入民主转型困境?当我们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视角来仔细梳理这两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主转型所依附的基础与条件时,答案似乎并不难找到。

经济不平等:民主基石缺乏

无论是作为政治集权国家,还是转型后发国家,上述北非诸国如此快速的政权崩盘在非洲地区乃至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虽然北非政治社会动荡伊始,一些西方媒体便难掩兴奋,迅速将其冠名为北非阿拉伯国家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阿拉伯之春”,但这场抗议活动的起源其实并非主要针对“政治不平等”,而是“经济不平等”。而经济发展滞后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民生”问题又是构成上述国家“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不平等”导致民怨沸腾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街头抗议活动,起因均为民众对低收入和高物价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的不满。如在中东变局的源发地突尼斯,大规模示威的火种源自一位失业并因父亲早亡而承担着对弟妹的养育责任的大学毕业生,他用自焚的极端方式抗议城管和警察用粗暴手段没收其街头零售摊,而且几经交涉仍无法索回这一几乎全部家当之后的绝望之举。它反映的是2008

^① 突尼斯自2011年末起草新宪法以来,党派纷争和政治暗杀不断。直至2014年1月,该国制宪议会才通过新宪法,并于同年底成功举行了总统选举。88岁的突尼斯呼声党领袖埃塞卜西成为该国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突尼斯当前除了面对振兴经济和降低失业率的挑战(2015年第一季度,突尼斯经济增长仅1.7%,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0.2%),而且安全层面也有隐忧。据悉,超过3000名的突尼斯人前往伊拉克与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IS)领导的“圣战”,是“伊斯兰国”外籍武装人员中人数最多的来源国。

^② 奥马尔·穆罕默德:《“阿拉伯之春”革命已经死亡》,载[美国]“石英”财经网站2015年5月20日刊发文章,参见《参考消息》2015年5月22日。

年后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突尼斯所出现的高物价和高失业（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比率高达50%以上）现象以及执法失当所致的警民冲突的社会矛盾。另外，抗议群众喊出的口号也主要是“要面包，要工作，不要本·阿里”，目标指向主要为经济问题以及应该对这些问题负责、并因长期执政而招致不满的总统本·阿里本人。虽然在骚乱爆发前，突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最稳定、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全球经济竞争力还数度被世界经济论坛排列在非洲以及马格里布地区之首，但经济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汇率的大幅波动暴露了突尼斯经济过度依赖欧洲市场的脆弱一面。对欧洲市场出口的萎缩、旅居欧洲突尼斯侨民侨汇收入的下降以及旅游业的不景气，使得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物价上涨，老百姓生活品质下降。本·阿里执政期间重视教育，突尼斯教育普及率很高，但如今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找不到工作，有限的工作机会又往往被任人唯亲的权势部门的人把持，因而加深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

埃及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表面看，穆巴拉克的倒台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蝴蝶效应使然，但深究其原因，突尼斯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压垮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长达30年的执政时间里，穆巴拉克政权已经积聚了太多的沉珂和民怨。埃及本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和中东地区较先进和发达的国家，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埃及迅速走向衰落，成为一个主要依靠老祖宗留下的文明古迹吃旅游饭的国家。笔者在2007年5月赴埃及考察时曾亲眼看到首都开罗城郊成片的烂尾楼群以及众多追逐游客讨要零钱的埃及孩童。一方面，埃及人口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则称，埃及半数成年男性没有工作，90%的埃及妇女在毕业两年之后仍然失业。美联社2010年5月6日的报道称，埃及8500万人口中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接近贫困线（联合国规定的标准贫困线为每天生活花费不足两美元）。^①

拥有丰富石油资源但人口规模尚不及埃及1/10的利比亚，则是典型的国富民穷、贫富悬殊的国家。虽然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高达上万美元，但下层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很低，巨额的石油收入并未惠及普通民众，

^① 安维华：《埃及：尼罗河畔的“大饼革命”》，载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143页。

尤其是长期处于发展边缘的利比亚贫困的东部地区（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抗议就是从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开始，并逐渐向全国蔓延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加上国际经济制裁对利比亚经济的不利影响，致使利比亚社会福利开支削减、通货膨胀率上升（油、蛋等基本食品的价格涨幅超过了50%，甚至100%）、失业率也连年攀升达到20%~30%之间。^①而卡扎菲及其8子一女则把利比亚国家银行变成了其家族的提款机，不仅涉足国内的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讯、社会基础设施等产业，而且经常豪掷上亿美元购买国外的别墅或者足球俱乐部，等等。

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品质下降和贫富分化差距的日益扩大，再加上上述北非国家强人长期执政、高压和专制统治、裙带关系以及政治体制僵化、统治阶层的腐败行为等（和卡扎菲家族一样，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下台后均被曝光了总统家族敛集的巨额国家财富），终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民怨经突尼斯小贩“自焚事件”的刺激而喷发。

（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才是民主建立和巩固的基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服务于经济基础。民主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上层建筑，因此，民主的存在与发展、民主的性质与形式，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民主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列宁曾明确指出：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③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决定了原始劳动的平等性质，并导致原始社会中自然形成的民主制。而奴隶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是以人身占有、依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因此一般建立的是以特权等级制为特征的专制政治制度。现代民主制度则是随着资本

^① 《利比亚及它的“卡扎菲时代”》，载大公网：<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brexpo/2013-08/1871509.html>，2015-06-0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版，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③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告诉我们，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做基础，民主这个上层建筑的根基就是不坚实和不牢固的。同样，指望通过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一举解决严峻的经济问题则更是痴人说梦。威权政府可以在一夜间被推翻，但经济发展和发展的红利却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并使民众享受到。当人民走上街头并带着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和对民主的极大热情积极参与投票和选举时，他们希望的是新的民选政权能够给人民带来“面包”、“工作”和“自由”，新政权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来为这些“信任选票”背书和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否则，民众的“信任选票”甚至等不及下一次选举就要强制收回。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及其领导人穆尔西的命运就是这一定律的生动诠释。

埃及在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后的次年6月，选举产生了近60年来首位非军方出身的民选总统——穆兄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然而，在其后一年多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由于各利益相关方和各大政治力量（如世俗和宗教势力、前政权残余和新兴政治势力等）均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政治利益和权力的博弈，穆尔西及穆兄会也表现出极强的权力占有欲，不仅屡屡打破自身约束权力的既往承诺，而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亦毫无建树、交不出让人民满意的任何“成绩单”。埃及的经济发展在政治变革之后反而呈现的是加剧下滑的态势，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5.1%猛烈下滑到2011年的1.8%，2012年则继续下探到1.5%。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贫困率粉碎了一些人寄希望于政治变革带来民生改善的梦想。^① 很多人终于明白，民主并不能自动带来面包和工作。资本和投资总是喜欢与稳定的政治环境比邻而居。可以说，正是人们梦想的破碎和民生状况的不升反降最后导致仅仅上台一年的穆尔西早早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命。

另外，从大规模抗议活动产生的实际效果看，社会大动荡非但没有带来自由民主以及经济发展，反而使国家走上了动荡-衰弱-再动荡的恶性循环。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不仅远未迎来“民主”与“自由”，甚至稳定与安全环境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经济和社会发展。自从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

^① 埃及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数字可参见《英国经济季评》及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埃及国别网站。如：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fz_605026/1206_605052，2015-06-02。

亚乱局从未停止。目前,该国东、西部甚至出现了两个平行的“国民议会”和两个“政府”相互对立的乱象,有进一步滑向“失败国家”的危险。

近年来的北非政治变革浪潮还揭示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真理,那就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不管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政体,都必须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变革”也好,“革命”也罢,其终极目的都应当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经济与政治权利。当尘埃落定,热闹的街头抗议和“革命”过后,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不进反退,没有“民生改善”支持的“民主诉求”则会很快蜕变为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很快就会凋零和枯竭。

社会分化:民主的阶级属性尚未形成

虽然和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比,北非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阶层分化程度都相对高一些,但距离现代民主制度建立所需要的阶级构成和政治组织架构形成(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政党制度建设等)仍有较大的距离。在利比亚,卡扎菲40多年的家族统治基本建立在部族社会以及部族忠诚的基础上。埃及社会的构成要素也并非现代意义的阶级、阶层或政党,而是军方、世俗派力量和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

(一)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具有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和民主具有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和民主,这是马克思民主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观点。列宁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①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形态的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上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政治制度无非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居于国家政权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和愿望,构成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机关和手段。民主的阶级性主要指民主代表哪部分阶级的利益,它由国体的性质所决定。只要国家政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民主就归哪个阶级支配。因此,考察一种民主政治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揭示其阶级统治的实质,认清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① 列宁也指出，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对群众的欺骗。^② 列宁还把那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是“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或“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等观点，斥责为小资产者的幻想。^③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的西方民主理论是虚伪的，实质是抹杀民主的阶级性质。超越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阶段、区域、民族、阶级的抽象民主、普遍民主和绝对民主是从来不存在的。不论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制，还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概不例外。

其实，民主的阶级属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的社会化大分工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在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以及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既无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阶级及其政党，民主阶级属性的先天缺失使得后强人时代的民主转型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基础。

（二）“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

卡扎菲的儿子曾说过，“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这句话还颇能说明利比亚的政治现状。^④ 部落是构建利比亚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利比亚民众的社会归属。据统计，分布在利比亚各地的部落大小共有几百个，中等规模的约有 30 多个，主要分成三大部落联盟：即在东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萨阿迪部落联盟（The Sa'adi Confederation）；在中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阿瓦拉德-苏莱曼部落联盟（The Saff Awlad Sulayman Confederation），卡扎菲所属的卡扎法部落（Qadadfa）和利比亚最大的部落瓦法拉部落（Warfalla）就属于该部落联盟；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巴哈尔部落联盟（The Saff al-Bahar Confederation）。“由于利比亚在历史上并未形成国家层面的公共权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4 页。

^② 列宁：前引文，第 600~601 页。

^③ 列宁：前引文，第 581 页。

^④ 《利比亚及它的“卡扎菲时代”》，载大公网：<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brexpo/2013-08/1871509.html>，2015-06-01。

因此，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祖先凝结而成的家族和部落，以及伊斯兰传统始终是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依据，致使利比亚在历史上有部落而无国家（Statelessness），呈现出‘碎片化’的政治地理特征。”^①

卡扎菲执政初期，曾一度试图打破利比亚社会中的这一“部落等级制”结构，但效果不佳。20 世纪后期，内外交困的卡扎菲政权为巩固统治，又刻意回归和使用“以部落制部落”的方式来强化利比亚的“部落等级制”结构。卡扎菲家族、卡扎菲所属的卡扎法部落，以及由西部和南部的瓦法拉部落和马加哈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成为维护卡扎菲统治的 3 个同心圆。这些部落控制了利比亚政府的主要机构和安全部门，在国家财富的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利比亚东部地区的部落和少数民族则备受打压。^② 因此，东部区域及部落人员也是最早揭竿而起反对卡扎菲统治的。

浓厚的部落色彩不仅体现在权力、财富占有以及安全和军队构成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宏观层面，也体现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圈等微观层面。姑且不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对部落酋长的效忠强于对国家的认同，即便在大城市，由于“利比亚的城市化源于农村的家族和部落向城市的整体性迁徙”，“来自于同一部落的人往往居住在相同或相近的街区，他们在安全和就业等方面相互帮助，邻里关系只是部落关系的延伸”。^③

正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的传统部落因素在利比亚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强势主导地位，加之在强人卡扎菲专制统治的 42 年里，利比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既没有宪法，也没有政党。因此，当危机爆发时，利比亚的政治前途也自然由部落来决定，部落便成为未来国家转型和新秩序构建的关键参与者。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各部落联盟拥兵自重，互不买账，冲突不断，目前统一国家架构的组建都成了问题，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和两个“总参谋部”的混乱局面。不同部落联盟又被不同意识形态裹挟，并得到不同境外力量支持。具有伊斯兰色彩的东部“政府”目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并得到土耳其、卡塔尔和苏丹的强力支持；西部“政府”则由世俗化的部落联盟领导，并得到埃及和阿联酋的扶持。两个“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相互攻讦，政治上千方百计巩固地位，军事上持续攻城略地。“伊斯兰国”（IS）等国际

① 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2013 年 2 期，第 117 页。

② 同上文，第 128 页。

③ 同上文，第 127 页。

恐怖势力则利用当前利比亚乱局，趁势在利比亚集结和扩张，已成为影响利比亚安全和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

（三）埃及社会存在以军方为主的三大主导力量

埃及自2011年1月以来，作为“风暴之眼”和重要政治晴雨表的开罗解放广场就几乎没有平静过，只是每次人们游行示威所针对的对象在变换，要被赶下台的“独裁者”在换人。在过去几年的政治转型期中，虽然表面上埃及也涌现出了名目各异的政党，但实际上埃及社会以及政坛上的真正玩家仍然是军方、穆兄会、世俗派势力这三大主导力量。而且三大力量在中东变局后的权力博弈中不断交替变换权力舞台上的主角和正、反方。

穆兄会和世俗派力量联手，通过声势浩大的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终于以18天的超级速度赶走了前总统穆巴拉克，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把持过渡时期权力的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将军们。在随后一年多的政治转型过渡期内，军方与迅速崛起的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埃及伊斯兰势力间的矛盾和对抗日益激化，双方围绕着议会选举、制宪委员会的组成等政治过渡“路线图”争执不断。军方在2012年6月总统大选之前甚至解散由穆兄会控制的议会，并把立法权、制宪权、预算制定权，以及对外宣战权等权力悉数收入囊中。虽然此后依照政治过渡“路线图”，埃及依次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经历两轮总统选举之后，民选总统穆尔西最终仅以微弱优势获胜。他在上任时就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因为他既没有军队的强大后盾，而且因议会和总统选举倒置性地放在了新宪法产生之前，新总统上任后尚不知在其后产生的宪法将赋予他何种权力。因此，为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统，穆尔西联手世俗派与军方展开了较量，并在2012年8月12日借助西奈半岛事件成功解除了原军方领导人国防部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等军队高级官员的职务，并任命了塞西等新生代的军方高层。

然而，遗憾的是，穆尔西及其穆兄会在与军方争权的过程中走得过急和过远。在上台执政的短短一年里，经“民主”手段产生的民选总统穆尔西及穆兄会一直以“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对权力的垄断和集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权力占有欲。2012年11月22日，穆尔西颁布赋予其自身更多权力的新宪法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强调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总统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都是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该声明一发布，立刻引来反对党和世俗力量如潮的抗议，认为穆尔

西的这一“扩权声明”妨害了司法独立，是大权独揽的独裁行为。人们再次潮水般地走上街头，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穆尔西及穆兄会对集权的贪欲以及在治国理政上的无能，加上日益表现出的伊斯兰政策倾向，使得原本支持穆尔西及穆兄会的一些知识阶层和自由派及世俗力量，甚至包括一些持自由化思想的穆斯林力量均开始站在了穆尔西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以民主方式上台的穆尔西及穆兄会正在蜕变为埃及新的“法老”，其所推行的政策已经与“民主”的本意相去甚远。

随着抗议浪潮的不断扩大，埃及三大力量之间的合纵连横又出现了新的组合。2013年7月初，国防部长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再次以强力介入政治，与世俗派力量联手把执政刚刚一年的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了台，并开始上演全力剿灭穆兄会的大戏。8月14日，埃及军方不顾国际舆论的压力，对开罗几个广场上的穆尔西支持者进行武力清场，造成了上百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的新的流血和伤亡。此后，埃及军方再出重拳，取缔有87年历史的穆兄会并宣布其为“恐怖组织”，没收其资产。据统计，自2013年7月以来，已有约2.4万名穆兄会成员被捕入狱。^①

2014年6月，脱下军装并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埃及总统的塞西宣誓就职，成为继穆尔西之后的埃及新总统。与此同时，穆巴拉克和穆尔西的命运也出现了乾坤大逆转。2013年8月，即军方逼穆尔西“下课”和收押他的次月，埃及法庭即宣布释放前总统穆巴拉克。这前后两位总统“一进”和“一出”的节奏被媒体解读为“埃及政治时钟的倒拨”^②。2014年12月，埃及开罗刑事法院宣布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等人涉嫌“谋杀示威者”和“经济贪腐”案罪名不成立，这一无罪判决使得舆论普遍认为埃及革命“死了”，这个国家又回到了穆巴拉克时代的“原点”^③。2015年5月16日，同一个埃及开罗刑事法院以“越狱”和“谋杀”罪名判处穆尔西死刑。消息传出仅两个小时后，埃及西奈半岛3名法官即遭枪击身亡。

埃及政治图谱在过去两年里所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与其说是“民

① 雷东瑞：《“重拳”打击穆兄会，埃及当局意欲何为？》，载新华网：<http://news.nen.com.cn/system/2014/03/26/012058304.shtml>，2014-03-27。

② 《穆巴拉克出狱，埃及政治时钟倒拨》，载《环球时报》2013年8月22日。

③ 参见王晋：《穆巴拉克，有罪无罪已不重要》，载国际在线：<http://gb.cri.cn/42071/2014/12/02/2165s4788121.htm>，2014-12-03。

主”转型的“成功”或“必经阶段”，不如说是“威权政治”的“回归”。埃及军方的“强硬之手”以及在埃及社会三大主导力量博弈中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展现无遗。虽然塞西将军脱下军装华丽转身为“民选总统”，但埃及军方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媒体以及经济领域的控制却日益加强。如今，在埃及被任命的27个省的省长中，17个由军队将领担任，其余或由警官统领，或采取文官与军官共管。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要么花落军方之手，要么跳过公开招标程序，要么直接承包给力挺军队的海湾国家大型企业。^①

总之，不管埃及军方此次走上政治前台的背景如何具有特殊性，但军人干政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也不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意。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军队本应该与政治相分离。而且，军人干政一旦反复上演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遗产，就会不可避免地民主政治构成一种惯性冲击，使民主化的建设更为艰难。

包容精神缺失：民主政治文化尚待培育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除了制度建设，更重要的还有民众素质的提高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打破旧制度、推翻威权领导人以及举行“民主选举”似乎并不难，但公民素质的提升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则十分不易，甚至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既需要针对大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也需要政治精英摒弃“胜者全得”（winner takes all）的旧思维，用包容和妥协的精神与政治对手打交道。

（一）民众的公民文化和民主素质需要引导和提升

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民主转型的成败与民众公民意识及民主素质的高低密不可分，并且互为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一段话就强调了民众素质以及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现代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受过教育的人，而不是毛坯状态的人，也就是经过培养而超越了作为纯粹生物存在的个人。……因为民主不单纯是一项保证多数人作决定的技术，而是一种以全体公民都负起个人责任为前提的管理制度。因此，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

^① 参见王丁楠：《判决穆尔西，革命的终结还是开始？》，载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WangDingZuo/2015_05_18_319899.shtml，2015-05-19。

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①

另外，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有关商品经济与自由、平等与民主关系的大量论述中，也多次谈到了经济发展对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作用。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就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马克思还指出，任何人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③ 我们从人类经济发展演进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发展中不难看到，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商品经济不仅直接促成了自由、平等、法制等基本民主原则的形成和出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民主主体，即人的发展和成熟。在自然经济或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商品货币关系决定，而是由血缘关系或统治与服从的人身等级和依附关系决定的。这种人身等级和依附关系极大地束缚了人的自主发展，容易使人陷入狭隘的地域观念、等级观念和民族偏见之中。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打破了这一切，通过参与商品化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建立跨地域的广泛经济联系，人的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都不断提高和强化，并逐渐产生了一支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地位、持有相同或相似政治诉求的强大中产阶级队伍，进而内生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

当我们考察中东变局后的北非国家民主转型时，不难发现：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不充分，不论是本·阿里对突尼斯经济实行的家族式垄断管理，还是卡扎菲在利比亚推行的“部落等级制”结构，以及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对军方控制埃及经济空间的放纵，这些具有封建专制性质的威权统治，客观上抑制了上述国家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中东变局的爆发并不是上述国家自身内部因素（包括有产阶级的壮大及其民主政治诉求的增长）发育成熟的结果，而是由华尔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与北非国家经济联系紧密的欧洲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的债务危机)而引发并加剧的北非国家经济挑战催生的。高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等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促使人们对现状说“不”，但对国家未来向何处去并没有多少思考和理论准备。当中东变局在猝不及防的节点爆发，这些北非国家的社会各个层面只是在“不要什么(如旧政权和强人统治)”方面能够迅速达成共识，但在“要什么”(伊斯兰主导的神权体制还是世俗体制，有伊斯兰特色的民主体制还是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方面不能凝聚意志，无法形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长期的威权统治、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复杂的教派冲突、缺乏充分民主信念的精英阶层、民众普遍缺乏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意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北非国家民主转型的巨大阻力。对于普罗大众民主素质的不足，阿拉伯国家的知识精英其实也早有洞察。出生于叙利亚的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和思想家阿多尼斯就曾对参与中东变局的街头示威者的民主素质提出过尖锐质疑，他说：“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禁忌、责难，只用疑虑、排斥、回避、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革命者’吗？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吗？”阿多尼斯还进而提出了确立公民观念和建立公民社会的设想。^①

公民文化及其民主素质的提高，既需要通过商品经济发展实践的催生，也需要通过社会思想的启蒙运动和开展公民教育来引导。当2013年夏天埃及开罗街头愤怒的抗议者们呼吁和欢呼军方采用“非民主”的“军事政变”手段，用武力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时，我们的确看到了上述的民众民主意识的缺失。

(二) 政治精英需摒弃“胜者全得”旧思维

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制度的转型过程中，领导这一“破旧立新”进程的政治精英自身的民主素质比起普罗大众而言更为关键和重要。在以往长期的威权政体统治下，“赢者通吃”、“胜者全得”的旧思维和专权意识给社会的政治精英们打下了太强的思想烙印和文化记忆。当变革的浪潮来临，他们也有机会从幕后走到前台，从“被统治者”变身为“统治者”时，他们往往忘记了当初作为“被统治者”对专权统治的痛苦记忆，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把

^① 转引自薛庆国：《阿拉伯剧变的文化审视》，载马晓霖主编：前引书，第438页。

既往的承诺迅速抛到脑后，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力和权利，拼命挤压甚至打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最后导致“玩火者自焚”的可悲下场。

埃及的穆兄会及其领导人穆尔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悲例证。穆尔西 2012 年夏天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胜选的得票率为 51.7%，仅比其竞争对手沙菲克 48.3% 的得票率多出 3.4%。如果再算上刚刚过半的投票率，实际上，穆尔西不过仅仅获得总计 9 000 多万埃及人口中约 1/4 人的支持。按理来说，以微弱多数险胜、并且既无强势的军队支持又无执政经验的穆尔西及其穆兄会，应该对其他政治力量采取低调、尊重和包容的政策，接受他者和保护失败者的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埃及走出穆巴拉克威权政权留下的阴霾，走上发展、民主和自由的康庄大道。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民主选举方式上台的穆尔西和穆兄会其实并没有掌握民主政治的真谛和民主政治文化的精髓。他们不断打破自身竞选时许下的约束自身权力的承诺，急切地向军队、司法等埃及旧有权力架构中最坚实的堡垒开炮，最后反而使自己沦为了“炮灰”。

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北非国家近年来的政治转型实践已经证明，举行“民主选举”易，培育“选举文化”和“民主政治文化”难。真正的“民主政治文化”必须有包容与妥协的精神内涵。民主的“选举文化”也要求“输者”能够承认失败，“胜者”能够兼顾并且保护“输者”及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与之相反。正如沙特著名作家图尔基·哈麦德所指出的：“民主不仅是选举和投票箱，它更代表了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理应在人们走进投票箱之前深入人心。这些价值观包括宽容、接受他者、承认选民的意愿，即使这种意愿让你失望。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这些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是匮乏的。”^① 正因匮乏，才更显珍贵，也才更亟需弥补和培育。

总之，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经济属性、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告诉我们，民主的产生、建设与巩固，必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走向衰败的经济和民生、日益分裂的社会、缺乏宽容、尊重和容忍的政治文化，都会对北非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构成严重的制约甚至阻碍。如今

^① 转引自薛庆国：《阿拉伯剧变的文化审视》，载马晓霖主编：前引书，第 438 页。

“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利比亚的内乱还未有穷期，突尼斯和埃及的社会政治变革仍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希望和祈愿北非国家能够抓住此次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历史契机，化挑战为机遇，尽快走出民主转型的困境。

Democratic Transition Predicament in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after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An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Democratic Theories of Marxism – Leninism

He Wenp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attribute, class attribute and cultural attribute of the democratic theories of Marxism, the emergence, constr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must hav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base,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influenced by the “Arab Spring”, the failing economy, the deteriorating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 increasingly divided socie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short of tolerance and respect, have all constituted the serious constraints and even impediment for the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With time passing by, the so – called “Arab Spring” has turned itself into the “Arab Winter”. At the moment, Libya is still in the civil strife, while Tunisia and Egypt are still struggling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to walk out of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predicament they are facing.

Key Words: Democratic Theories; Marxism – Leninism;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